企业家日报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邮发代号:61——85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佳贵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轼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第 31 期 (总第 133 期)　2013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六　癸巳年 九月初八　投稿邮箱:j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新供给经济学”有破有立的创新诉求

■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想简要地勾划一下：我们现在具体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在我们自己的理解上,是特别强调了什么。已经有的文献,有《财经》、《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浓缩和重点报道，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全文则已发表在《财政研究》2013 年第 1 期。

我们作为研究者，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取向上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我们的用意,应该讲具有强烈的“文章合为时而作”、密切联系实际、对于实践提出的客观需要做出回应的诉求。我们认为理论研究工作者要通过自己深入研究所形成的分析认识来服务和指引实践。在研究工作中间,我们形成了如下这样一种框架性认识：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如果说研究中具有对已有认识的“破”,我们想首先提到的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是需要反思的，国内外很多人士，包括西方非常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者,也都有类似的评价。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在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一些领袖人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做出预警？而经济学家自己的群体里面也有这样具体的看法，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我们十分需要对于经济学有所创新和发展。

这个反思中，首先要看到我们现在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即反思后应提出的“破”的内容要点。我们想比较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重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却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在最近若干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为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侯，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我们现在必须特别认识和分析的现今世界上经济体成功的代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前几十年的经济实践里，实际上在应对滞胀的现实需要和压力之下，在供给侧的认知上是有贡献的，就是出现了大家都注意到的供给学派。它的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它的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是有明显的不足。学术界也有这样的说法：虽然他们的政策主张在“里根经济学”的概念之下有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是他们的理论不够系统。可以说,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么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是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他们不像另外一些经济体,比如中国,有这样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也自然而然就上不去。

我们还可以比较直率地评价一下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以后发展到经济学或者理论经济学这套表述——它现在仍然存在和实践有“言行不一”的问题这样一种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间，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是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他们自己也找不出清楚依据的，但是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 150 多年的老店就任它垮台,在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方面,其实美国是可圈可点的，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 3D 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框架，而是很明显地是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在供给端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回想到多少年以前，中国曾经风行大家都看的《亚柯卡自传》,当时就注意到最后亚柯卡画龙点睛的那句话是说“重振美国之路,就在于产业政策”(当年那个中文版翻译成“工业政策”,实际上就是英文的 Industrial Policy ,更准确地翻译是“产业政策”)。这个“产业政策”也是一种从供给角度、从供给端有区别才形成现有政策的这样一种调节工具。而在需求侧他们特别强化的“量化宽松”,现在已经引起一系列的反思与警觉。

这些都说明,以关注、强调、深入认识供给侧这样一种更对称性的理论框架来支持实践方面的优化配置资源的操作或者调控，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的问题。

反思之后,我们还强调,能不能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以更开阔的、要对经济学理论创新争取有所贡献的这样一个视野,考虑我们能够“立”的东西。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摆出来,作为认识的一个必要环节。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始发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可以把始发命题直接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是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边无非是如实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的主体，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该以创新意识来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以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是不可回避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认识不足。我们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如实地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有极其值得重视、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认识的意义。特别是解决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么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包括已经到了比较发达水平的先进经济体,他们怎么样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的需要。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的和人的这两个视角都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在一起。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就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的视角上，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方面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里面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的对称性提高。

落到现实中间,合乎逻辑的我们必然会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追求中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关键一招”、李克强同志所说的“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的贡献是:希望最后落到大家都有明确意识的、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面。

上述这些基本认识后面，意在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而引出的被称为新供给经济学探索中间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所谓“八双”。

(下转 02 版)

当代资本主义纵横谈

——《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一书作者李琮访谈

■ 本报记者 启文

【访谈第一部分】

记:首先,请问李先生,您为什么选定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这一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并写出这样一部篇幅可观的专著,它的意义何在?

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自 16 世纪算起,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过程,呈现着明显的阶段性。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同于前一段的新的基本特征。为了对资本主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必须对各阶段的基本特征,从而对其基本矛盾和基本趋向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变到垄断阶段后,列宁曾对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特征着重进行研究，对其矛盾的激化进行揭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并对当时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掀起的社会革命起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和有力的推动作用。

自从那时到现在,又已过去约一个世纪,在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在继续。中外学者也都不断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我国学者对此尤为重视和关注。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学界曾对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认为早在二战后(有人认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开始)资本主义已从一般垄断（私人垄断)阶段转变到了国家垄断的新阶段;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已从国家垄断阶段进入国际垄断阶段(有人认为是跨国垄断阶段，或其他名目)，并且列举了这些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矛盾。我们之所以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的阶段性发展特别加以重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自力更生外,还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加强互助合作,包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愈益密切,双方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人员等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断扩大和加强，以致互相密切依存,不能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有协商和合作,也有摩擦和斗争。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共处因素在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快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发展、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 《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一书于 2013 年 3 月出版。该书对当前人们所关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从实际与理论的结合上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作者个人的观点，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被列入今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引起学界和读者的重视。作者李琮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现为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就该书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李琮先生(以下简称“李”)进行了访谈。访谈分六部分刊出。

此外,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发展和新问题,对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必要的;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放眼看世界,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有助益的。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近 70 年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国家垄断阶段和国际垄断阶段有关问题,我国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已很多,不需我再重复，我试图从另一角度，提出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如,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如此明显的阶段性? 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与所谓“经济长波”(长周期)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有时会发生特别严重的大危机? 大危机对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起着什么作用? 对国际经济关系有什么影响? 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影响? 对世界大趋势有什么影响? 最近发生的这次罕见的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也可能是人们更为关注和更感兴趣的。我最近出版的《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一书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写的。

记：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具体表现在哪里？或者说,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什么？

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或基本社会生产方式,其实质、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但当它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时,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会发生局部的质变。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这是不会变的,但在自由贸易阶段,是个体资本家占有制，或少数资本家的股份制,而到垄断阶段,则是垄断资本集团占有制,到国家垄断阶段,是资产阶级国家占有制，而国际垄断阶段,则是国际垄断集团占有制。占有制度发生部分质变，企业规模和形态,组织管理方式,内部关系也都会发生相应的局部质变。在国内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对外经济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列宁所列举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变到垄断阶段后生产关系方面发生变化的体现。与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

记: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为什么会发生阶段性变化,使它能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新阶段的转变？

李：人类社会不论是什么制度,在其出生到衰亡的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定阶段。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如封建社会,其生产力还不高,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的技能是世代相传的经验逐渐积累改进,其水平提高缓慢,其发展的阶段性也就不那么明显。而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科学技术兴起,科学在生产力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乃至革命性作用,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样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也改变了旧社会那种几近停滞的状态,一日千里的前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强烈要求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发生改变,与其发展相适应。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快步前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是经常会发生的,一般性的发展和创新不会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发展,只有特别重大的、基础性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问世,并且广泛应用于生产,导致新的产业群的产生和成长,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大变化,生产率和利润率得到明显提高,才会导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局部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就会从原有阶段转向新阶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从 18 世纪中叶,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由蒸汽动力普遍应用于生产而发生的。这场革命推动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步发展;19 世纪中叶以后，电力的应用引发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转变;19 世纪 50 年代兴起的以半导体电子技术为主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拉动了垄断阶段转入国家垄断阶段,80 年代兴起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又一次高新科技革命高潮,拉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垄断阶段过渡到国际垄断阶段。

(下转 02 版)